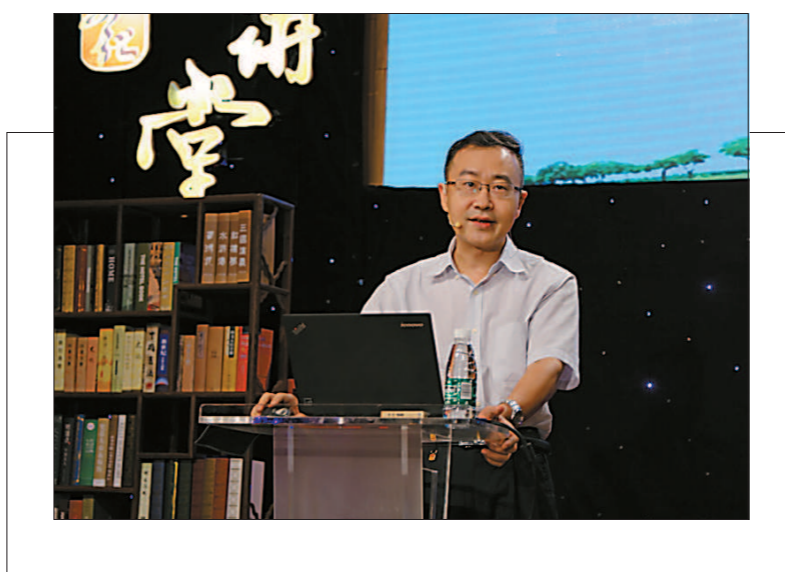


教科书里,有中国教育的百年演变

201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立项了一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百年教科书研究”,全面研究近百年来各学科的教科书发展。不久前,参与该课题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副院长黄牧航教授,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与大家分享了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演进过程。

■ 演讲 黄牧航
■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教科书真的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教科书塑造起来的。对教科书的研究,将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尽管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比过去丰富得多、容易得多,但教科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
——黄牧航

听讲座

徽州到底算不算江南

■ 唐力行

近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力行讲述了明清以来苏州和徽州之间的区域互动。

从古代行政区划来讲,徽州和苏州都属于一个大江南。

在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同属于扬州之域。春秋的时候,苏州建立过一个吴国,徽州就属于吴国。此后,徽州与苏州的隶属偶有分合。宋朝同属江南道,元朝同属江南行省,明朝同属南直隶。清初同属“江南省”,就是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到乾隆二十五年,正式划分为两个省,一个江苏省,一个安徽省。

苏州与徽州虽然从行政区划上同属江南,但是它们的地理风貌完全不同,苏州是一片平原地区,是江南水乡,而徽州却是山区。徽州虽为崇山峻岭,却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它离江苏、浙江平原地区非常近,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江南地区逃避战乱的一个绝佳去处。所以自古以来,北方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遇到战乱就南迁,逃到江浙平原;而当江浙平原又出现战乱时,他们就以宗族为单位,继续逃难到徽州,因为这是一条最便捷也最安全的路。

到了明代中期,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徽州人开始往东迁移,到杭州去做生意,到苏州去做生意。

为什么徽州人能在江南做生意取得成功呢?徽州人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宗族聚居。过去有句古语这样形容徽州人:“千年之家,不动一抔土;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千年宗族血脉,家谱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凝聚力特别强。第二,重视教育,科举发达。中国的国学是儒学,儒学到宋代以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理学,而徽州是理学的学,理学上的创始人朱熹就是徽州人。据统计,中国府一级科举最发达的城市是苏州,其次便是徽州。第三,具有经商传统。因为徽州山多地少,所产粮食只够维持徽州府的人吃一个月,其余11个月的粮食都要到外地去买,这使得徽州人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徽州山区里有什么?有木材、茶叶、油漆,还有文房四宝,这些都是徽州人用以交换的土特产。徽州人经商还有一个特点,“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因为宗族有一套组织系统,“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徽州人的这三大特点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一个人出去经商,整个家族都会有人参加他的经商,所以徽商的凝聚力特别强,因为在他们的商业集团里,都是互相信得过的亲属或同乡。同时,徽商心甘情愿地资助宗族,心甘情愿地支持教育,而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一旦当上了官,又反过来支持徽商的事业,也会提高宗族中的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善于审时度势,更有竞争力。

根据我对上海地方志的研究,上海周边的很多小镇上都曾经有过徽州商人,像南翔、真如、黄渡、安亭、娄塘等等,大多曾经是徽州人的天下。著名文人胡适先生也是徽州人,他曾经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了小市镇。”所以,有句古语叫作“无徽不成镇”。为什么徽州人的店铺能逐渐扩张呢?就是因为徽州人宗族观念很强,一个人开了店铺,不久他的同族同乡人就来了,又在边上开店,于是逐渐热闹繁荣起来。

徽州商人所营以典当茶木为主,兼及百业,是江南最为富有的商帮。他们来到江南的商业中心——苏州,利用他们的宗族优势在苏州扎下根来。徽州、苏州之间的整合与互动,是一个从人员流动、经济互补到文化认知交融的过程,也是一个徽州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在传统社会里,徽州人一直自认为是江南人。随着苏州与徽州的整合,传统时期的江南实际上就在不断扩大之中。到了近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当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来以后,南通(地处江北)也成了“江南”,因为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建轮船公司,搞纺织业,与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近代也有很多像南通这样的地方,既不是行政意义上的江南,也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但是它们都因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了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的边界一直在变动。今天我们已经有高铁,现在3小时高铁路程所形成的一个城市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江南”。打破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边界和地域边界,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建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这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我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每一个五年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上都是全额完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超额完成,关键在于五年规划实施由规划计划体系、宏观政策体系、实施保障体系这三大体系支撑。”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近日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上,这样解读“五年一大步,我们如何一路前行”。



“当今的反腐气势可以用‘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一击、震撼四野’来形容。在二十四史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和时期曾有现在的反腐力度,过去的反腐,只是在某一个阶级或是阶层,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我们全党的共同意志、决心和行动。所以说,如今的反腐是全社会、各阶层的,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

——近日,著名作家二月河去世,终年73岁。十九大代表二月河曾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这样对青年人讲述当下的反腐。



“内地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学校都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说的是,一个系里面,你的老师、老师的老师、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都在一起。因为很多大学基本上不聘用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只聘自己的毕业生,所以就有了‘四代同堂’、‘五代同堂’现象。这不是好事,这种现象需要破除。”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近日接受采访,面对“内地的高等教育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的提问,他这样回答。



“对一般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个苦差事;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研究实在是牵肠挂肚、茶饭不思、情有独钟、妙不可言。科学家往往需要独立人格和一点点脾气。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对世界上的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而恰恰是一些有脾气的人才不会轻易随波逐流,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不久前在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这样谈科研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外患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威胁,所以中国在国防战略上采用的是防御性战略,目的是维持内部的大规模稳定,但它本身没有对外侵略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味追求规模而没有边界,这是一种重视内部、‘做最好的自己’的智慧。”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上,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这样阐释中国国强不霸的历史与文化缘由。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要了解中国百年的教育发展,教科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我国近代教育,不可否认,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同时,晚清民国期间的教科书,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

开学第一课都讲了什么

过去100多年来,小学课本开学第一课讲了什么,这毫无疑问反映了百年教育的缩影,也让我们得以直观地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曾经收集过一套晚清的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里面图文并茂,而且图片非常鲜艳、漂亮。其中的第一课讲的是《预备立宪》,配的图片是一个会议场面,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头上还是辫子,整个国家的体制面临改变,他们在很认真地期待“立宪”的到来。

晚清修身教育课本《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在当时曾经是第一大课程,也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第一课讲《仪容》,先要把仪容整理好,比如怎样对待老师、同学,这些内容都通过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修身教科书》,第一课讲《入学》,也是介绍入学后的仪容仪表礼貌。

辛亥革命之后,教育部颁发的第一套教科书中,《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讲的是《国体与政体》,《共和国修身教科书》的第一课讲的是《道德》。

过去100多年来,小学语文课本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比如,1937年第一课讲的是《动物、植物和矿物》,那时强调实业救国、科技救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开始抗战,1941年的第一课是《卢沟桥》。

1950年的第一课是《清洁卫生》。在近代中国,我们把卫生与保国保种结合在一起,讲究卫生不仅仅是个人健康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兴亡,所以当时把卫生问题看得很重;1981年的第一课是《春天来了》,因为197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来了。

纵观历史长河,几乎所有学科的内容都有一个演变过程。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语文”,是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概念。以1922年为界,1922年之前称为“国文”,1922年之后称为“国语”,1949年,叶圣陶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语文”。我们现在的地理学科,古代不叫地理,叫“舆地”。舆地更偏重于人文地理,而我们近代所说的地理主要是指自然地理,地理学科从人文地理为主逐渐过渡到自然地理为主。

此外,教科书还是百年中西文化交融融合的见证,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科书本身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比如,我收集的一套教科书《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经典的蒙学读物,但到了近代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翻开书页可以看到,中间是图画,下面是竖排的中文,而最上端是英文,出现了大量的英文单词和句子。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是中国教育的标志和代表人物孔子的画像,而画像上方却是26个英文字母。当时没有音标,只能用中文把英语拼出来,按照中文方法来念。读到这本书,我内心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一批名家支撑起近代教育

要办好教育,首先得有好的老师,好的校长。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也需要好的教育家,好的出版家。支撑起近代教育的,正是一批民族的脊梁。

讲录

■ 曹文轩

我们亲近文学这么多世纪,一代一代人都与它难舍难分,一定是有很多理由的。

理由之一:确立道义观。

人要有道义,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必有道义的原则,必有道义的支持,而文学就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天赋厚实的功能。

毫无疑问,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若干世纪过去了,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变化与演进。但它却慢慢地沉淀下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无私、正直、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仁爱之心……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

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人类在道义方面却每况愈下。尽管在理论上仍然十分强调精神高度,而实际上更在意的却是物质。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文学——文学能够与其他精神形式一起拯救我们,至少文学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凡文学必以道义为本,亲近文学,也就是亲近道义。

理由之二:营造审美境界。

一个完人的精神世界,是由许多维度组成的,其中,审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文学的根本性功能之一就是审美,文学越来越在意审美价值。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一大区别

张元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组织编写的新式中小学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于张元济的故事很多,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接连向商务印刷总厂掷下6枚炸弹,并焚烧了号称“东亚最重要的藏书楼”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将46万册藏书包括3万多册珍本、善本全部付之一炬。看到漫天的浓烟,张元济非常痛心,但他没有就此屈服和消沉。

图书馆被炸毁的第二天,66岁的张元济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编一套复兴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他说:“为人须振作精神,不可稍形颓丧。人生处世必有不如意之时,愈不得意,愈能振作,便不难入定胜天。”从第二天开始,商务印书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近代教科书史上编撰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套里程碑式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共有738册,我至今也没有收集全。但是,每当我看到这套教科书,心里就想,近代中国多次灾难,但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拥有无比的毅力和韧劲,在越艰难的时候,越能够振作图强。

通过研究百年教科书,我们还了解了一些原本并不熟悉的中国教育家。

比如陈子褒,这个人在晚清民国期间大名鼎鼎。他是广东江门人,热心于基础教育,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基础教育。在他那个时代,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曾经说过:“妇孺之学,则大人圣人至人之基也。”他编写的46种教科书,都是用粤语白话写的。

还比如黄晦闻,曾经是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过教,他编写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把广东重要的历史事件、名人写给学生们看。

此外,美国教育家杜威于1919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时间,走遍了18个城市。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从当时的教科书中可以很充分地看到这一点。《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就体现了经典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教材中运用了戏剧表演的形式,模拟在一个米店里买米的场景,这和现在新课程中提倡的情景教学是一样的。

由教科书塑造的我们

我认为,研究教科书不是教师的事情,每一个有兴趣的人,有条件的话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积极搜集、保护和整理百年教科书,传承千年文脉。

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多次灾难,一套教科书经历如此多的战乱,能够保留到今天是一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哪怕是破破烂烂的碎纸片,也是有历史温度的。尽管现在有些书籍可以电子化,但是电子化永远替代不了你亲眼看一下实物,亲手摸一下实物,因为那是前辈留给我们的遗产,所以大家千万要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碎纸片”。

我曾经收藏过两本手抄的教科书,估计是一个穷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一笔一画抄下来。他抄的是什么书?《共和国的新历史》与《共和国的新理科》。这两本书破破烂烂,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它的开本和我们正式教科书的开本差不多,但这个学生只能用一些发黄的纸,抄完以后装订在一起;每一页的内容和正式的出版教科书完全一样,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包括排版也是。而且,他不光把文字抄下来,还把教科书的配图也一笔一画地画下来。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很感动,民国时期能够读得起书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这样一股韧劲,把教育看得很重。

最后我想说一晚清民国期间的教科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借鉴,可以促进课程开发以及教科书的编写。

我认为有以下四类教科书,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启发。一是女子教科书。现在我们很少有男校和女校之分,但是女子教科书里有积极的内容还是可以借鉴的。1895年—1922年是女子教科书集中涌现的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子教科书,内容非常丰富。二是乡土教科书,把历史、文学、地理等各方面内容融入乡土教材中。三是活动教科书,也就是手工教科书。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动手能力差,有必要也编一些手工教科书、农业教科书等,让孩子们去学。四是个性教科书。这样的教科书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比如教材以作者来命名,《傅氏高中物理学》《朱氏初中本国语》《陈氏高中本国语》等等,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色彩。

因为理科的学科发展演变太快,理科教科书对今天的意义没有过去那么大,而文科教科书,尤其是关于德育方面的教科书,对我们今天的启发依然很大。晚清民国修身教科书的一大特点,是澄清了公德与私德的差别,很多内容被故事化、形象化地呈现出来。比如说,两个人并排坐,为什么不能跷二郎腿?因为你妨碍旁边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比如,要爱惜旅馆里的公物,借别人的书一定要爱护,游园不可伤害一草一木,等等,都是很具体地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教科书真的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教科书塑造起来的。对教科书的研究,将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尽管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比过去丰富得多、容易得多,但教科书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教科书的原因。

我们需要文学的若干理由

就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作“情调”的元素。情调属于美学范畴,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时过境迁,都可能衰变为常识,但只要一样东西是永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与文学亲如手足,不能与文学有一时分离,正在于文学每时每刻都在发现美,从而使枯燥、烦闷的生活有了清新之气,有了空灵之趣,有了激活灵魂之精神,并且因此美而获得境界的提升。

理由之三:培育悲悯情怀。

没有情感的人大概不能算是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情感的产物。人们对文学的阅读,更多的是寻找心灵的慰藉,并接受高尚情感的洗礼。其他文类——比如哲学、伦理学方面的文章,一样是讲悲悯情怀的,但这些东西仅仅是让我们明白悲悯情怀的必要性,我们只是接受并懂得了关于悲悯情怀的观念。但文学作品——比如《呼兰河传》《边城》《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会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被感动,悲悯情怀会油然而生,我们会在对文学作品无休止的阅读中,成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

理由之四:输入历史意识。

文学能帮助我们记忆历史,而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可能是有质量的人。小说是最能满足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之愿望的文学形式。文学的使命当然不应定位在反映历史上,但文学因为留下了具体的情状,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使我们“可感”历史的作用。

理由之五:激发想象潜能。

也正是这个能力的存在,人类才拥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在文学长河中的游荡与游戏,无疑就是对想象力的操练。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想象力。

理由之六:强化说事能力。

一个人应当有两大基本能力:说理的能力和说事的能力。但在我们的理念里,说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说事的能力几乎不被我们所重视。文学除了抒情就是说事——说事是主要的。人们为了说事,而创造了文学,文学将说事变成了一种艺术,文学使我们看到,事与理具有同等的意义和美感。对文学的阅读,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说事能力的培养。

理由之七:提升语言文字水平。

语言文字能力,是一个健全人的基本能力。文学作品使用了一切修辞方式,并且由于它的积极修辞态度,从而使语言的神奇与魅力令人感叹不已。文学课是学生习得语言文字、获得和提高语言文字能力的重要途径。

我们需要文学,何止这7点理由?也许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能够让我们得以永生的世界。在那里,你在现实世界的缺陷得以弥补;在那里,你的灵魂得以自由;在那里,你摆脱了尘世的一切烦恼;在那里,可以梦想,并且感到梦想的诗意给你带来精神的快意;在那里,你追回了失去的一切,包括时间;在那里,你实现了你欲求实现的一切,包括你想成为世界之王。(摘自著名作家、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11月24日在“扬州讲坛”上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